

「永續發展」只欠東風

劉兆玄

2012 年 4 月

緒言

上世紀九零年代起，全球矚目的有兩個「崛起」：其一是 Brundtland Commission¹所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的論述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台灣一般譯為「永續發展」，以下從此)，另一個則是「中國崛起」²。

二十多年過去了。在「永續發展」論述中的三大支柱——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正義——中的前兩項，經濟與環保的均衡發展方面有了相當的進展，尤其在一些先進國家中都看到具體的成效；然而在「社會正義」這一環則比較乏善可陳，甚至有著墨甚少的感覺。當然，「社會正義」相較於前兩項是比較抽象而道德導向的，不容易形成可操作的具體方法；不過究其立論基礎，似乎也欠缺了一些什麼。

於是許多西方學者及各地本土人士提出第四根支柱：「文化」³。

如果「文化」是「永續發展」的第四根支柱，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文化能在這裡作什麼樣的貢獻？

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J. Toynbee) 曾經預言：十九世紀是英國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⁴。這種預言也許基於從歷史演變的瞭解中得到對未來趨勢的洞悉，但是考慮到英國及美國在十九、二十世紀對全人類文明、文化貢獻時，我們不禁要問：中國這個崛起中的經濟大國，在新世紀中對世界的文明、文化能有什麼貢獻？

¹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 Resolution 42/187, 1987

² Sujian Guo, Ed., "China's Peaceful Rise in the 21th Century", Ashgate Publishing, 2006

³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UNESCO, 2001

⁴ Toynbee, A.J. E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Japa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湯恩比認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困境要從儒家思想及大乘佛教中尋求解答，這似乎對前面的問題「中華文化能對人類永續發展作何貢獻」提出了鼓勵性的提示。

作者在 2010 年總統府中樞慶祝行憲典禮的演講中提出，我們應該把一種新的「王道」思想發展成為新的普世價值，用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來貢獻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文明⁵。

為什麼是「王道」？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⁶。」這話含有孟子在諸大國間碰壁後的無奈，因為他也曾說過，如齊國這種大國願行王道，則易如反掌。所以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處在「大」而未「霸」的十字路口，我們要提出的是「如何既大且王」？

換言之，如果中國大陸願成為二千年來第一個實行王道的大國，它必需要能創造新的政經體制，新的分配體系；它要能尊重差異協助弱勢，它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別於西方的「己所欲必施於人」），它要天人合一永續發展。

這就是新世紀的王道思維，二十一世紀的新普世價值。大陸有大國的潛力，台灣是尖兵及催化劑。

更具體地問：二十一世紀所談的「王道」在科學的認知中應具的內涵為何？生態變遷與經濟發展的對立挑戰下，「王道」的新思維能帶來什麼樣的新作為？國內的嚴重失衡（如貧富差距）、失序（如貪腐）以及族群衝突（包括種族及弱勢團體），「王道」的新秩序如何建立？國際政治中「王道」能引領什麼樣的新思維及新作法？二十一世紀公義思潮中「王道」如何成為其主流的價值？

⁵ 劉兆玄，「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中華民國總統府中樞紀念行憲演講，2010。

⁶ 孟子，《公孫丑上》。

科學裡的王道

我們先從科學認知中尋找新的啟發。

純「科學」不談功利價值，是無所謂「功過」的，它是人類透過理性的認知來瞭解自然界的奧秘，它強調的是 know what 及 know why；科技的應用則強調的是 know how，牽涉複雜的利害關係，既能為人類帶來便利繁榮，也可能為人類、甚至整個生態帶來毀滅性的破壞。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化學家之一 Fritz Haber 曾經說：「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無論是純科學或應用科學，其本身是沒有價值的，科學帶給人類的利益才是它價值的衡量。」但是「利益」和「價值」常因時空條件而變，「人定勝天」式的科學所帶來的利益常屬急功近利型的，因而難以長存；「天人合一」式的思維，才能產生比較持續長存的利益⁷。

「熱力學」、thermodynamics 是一門研究「熱」、「能量」、「功」的性質、相互關係及其變化的科學。它處理的是物質的巨觀 (macroscopic) 現象，正因為它處理的是極大數量個體的集體性質，許多個體的個別差異會被平均化。所以熱力學透過嚴謹科學所發展出來的「定律」有可能被賦予社會學的意義，進而對社會科學產生另類的啟發^{8、9}。

我們以氣體等溫膨脹 (isothermal expansion) 做功為例。

⁷ 劉兆玄，「天人合一的科學」，「王道思想與當代意義」論壇，南京，2011。

⁸ Smith, J.M. et al., "Introduction to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McGraw-Hill, 2005

⁹ Van Hess, H.C, "Understanding Thermodynamics,"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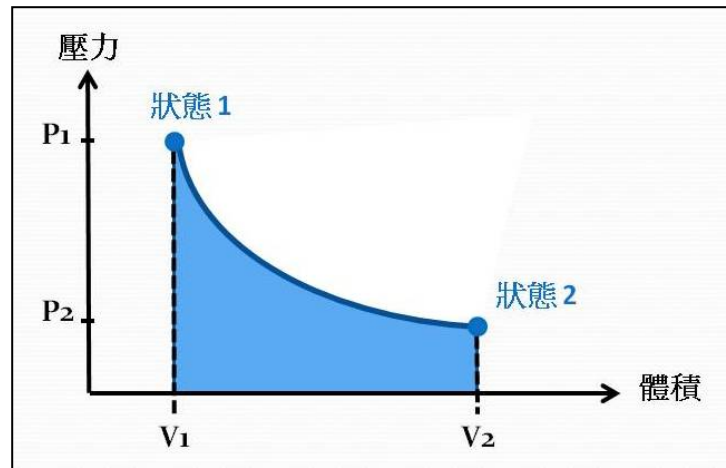


圖-1

氣體從狀態 1(壓力為 P_1 , 體積為 V_1)膨脹到狀態 2(壓力 P_2 , 體積 V_2) , 所做的功是圖 1 中 PV 曲線下面的面積。曲線上的每一點都符合理想氣體的 P-V 關係 ($PV=nRT$, n 表分子數 , T 是溫度 , 等溫膨脹時 T 是常數) , 這樣的膨脹過程是處於可逆的平衡狀態下進行 (reversible process) 。

但是真實的氣體膨脹不可能處於這種理想狀態 , 其過程一定是透過一連串的減壓膨脹步驟如圖-2 所示 , 其 PV 功等於色塊部分的面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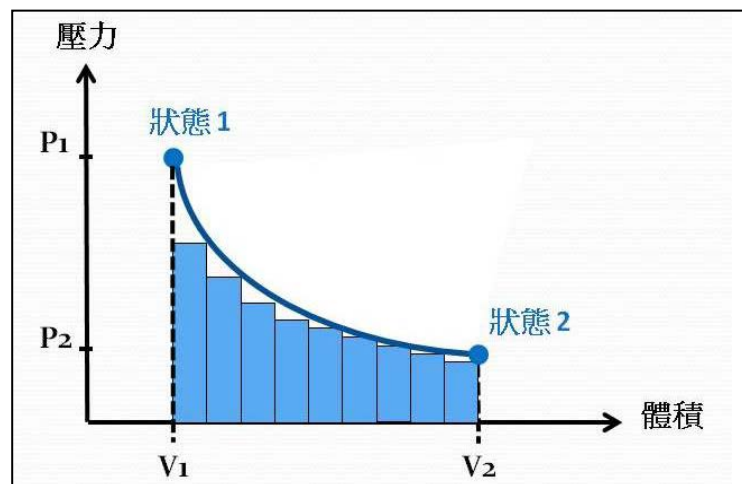


圖-2

比較圖-1 及圖-2 , 可知非平衡狀態所作的功總比較小 , 亦即氣體在可逆的平衡狀態下等溫膨脹所作的功是「極大功」。

如果此一系統是一個經濟體系，則體系在愈接近平衡狀態發展運作，愈能夠得到較大的成效（成長）。政府的角色應包括維持「等溫」。

很顯然，不論在理想的或真實的體系中，「平衡」狀態（或「接近平衡」狀態）是一個重要的參數，那麼我們如何定義、度量一個系統或程序的進行是否處在平衡狀態？或距離平衡狀態有多遠？

熱力學定義一種函數，叫做「自由能」(G)，一個程序（或反應）在平衡狀態下進行時，「自由能」的變化 (ΔG) 等於零。

換言之，只要 ΔG 不等於零，此一程序必繼續朝某一方向移進，直到 ΔG 等於零則系統達到平衡。

「自由能」的變化 ΔG 定義為：

$$\Delta G = \Delta E + \Delta(PV) - T\Delta S$$

其中 ΔE 是「內能」(internal energy) 的變化，

$\Delta(PV)$ 是對外所作的功，

T 是溫度，

ΔS 是熵 (entropy) 的變化。

如果這個系統是一個經濟體系，我們可以大致作以下的詮釋：

E「內能」，代表的是體系內「經濟能量」的總量； ΔE 就是經濟總能量的變化。

$\Delta(PV)$ 是體系對外所作的功；對體系而言，是負數 ($-W$)。

S「熵」度量此一經濟體系「多元化」的程度；「多元化」增加時， ΔS 為正值。

在這樣的情形下，「自由能」的變化， ΔG ，衡量的是此一體系距達平衡點的距離。 ΔG 愈接近零，體系愈接近平衡； $\Delta G = 0$ 時，體系處於平衡狀態。所以：

$$\text{自由能} (\Delta G) = \text{內能} (\Delta E) - \text{對外作功} (W) - T\Delta S (\text{多元化})$$

ΔG 接近零，則此經濟體系趨於平衡穩定，可持續發展。

ΔE (內能) 累積太大時，可用「對外作功」及「多元化」的措施來抵銷；否則 $\Delta G \gg 0$ ，體系遠離平衡狀態，發展將陷於極大的不穩定狀況。這是中國大陸的情形。

反之，「內能」(ΔE) 積弱時，如果仍採擴大對外作工 (如發動戰爭) 及寬鬆多元措施，則 ΔG 將變成很大的負數，則體系將負向遠離平衡，經濟發展亦陷於不穩定。這是美國的寫照。

定性而言，如果我們談的是一個「社會體系」，熱力學的討論可得到類似的結論。

王道與新世紀的挑戰

2008 至 2009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是一個新挑戰的分水嶺。大量印美鈔不可能解決美國財政—金融—就業的多重問題；歐元的債信如一觸即發的地雷，骨牌效應的隱憂籠罩在低迷的經濟上更是危機重重；日本長期的成長停滯後，東北核災對日本經濟更是雪上加霜；中國大陸的經濟則在快速崛起下產生諸多問題，內部的一些不穩定因素如貧富差距、官商貪腐、族群緊張等壓力，也面臨「硬著陸」的危險。

台灣雖能從金融風暴中迅速復甦，GDP 及競爭力都恢復成長，但在兩岸 ECFA 簽訂後，未來經濟發展的路線出現兩極化的爭議：是「失血、彼愈強我愈弱」，還是「擴大交流、強弱互補，兩岸互利」？

其實撇開意識型態之爭，更宏觀地看，台灣面臨的是「人民對公平正義的新要求」以及「國家永續發展的新挑戰」。台灣的 formulation 是什麼？

- (一) 「平衡狀態」的發展做最大的「功」，均衡發展的策略才符合「永續」的原則。這裡包含了能源（資源）、人才、國土的可持續發展；分配（含賦稅、社會福利）的合理調整；產業轉型走向均衡發展（軟體硬體平衡、製造服務平衡、外銷內需平衡）。
- (二) 善用大陸經濟大國崛起的利基。這裡面包含了兩岸進一步鬆綁、合作及簽定和平協議。
- (三) 多元化。建立新的經濟、社會統計及指標，納入新的要求及新的挑戰。在 GDP 指標之外，用各地區、族群、收入階層的社福統計及合乎正義的加權建立新的國民幸福指標。有多元的統計及指標，才能引導多元的施政。

這些策略基本上是為 ΔE 及 ΔS 注入新的指標內容及項目。它符合人民公平正義的新要求，也回應了國家永續發展的新挑戰；是王道思維為新世紀的需求所提供的發展之道。

霸道的發展模式強調單一成長突破，遠離均衡與多元，從長遠看其結果必然是似得實失，浪費資源，不能做極大功。

所以，霸道的企業可大，王道的企業可久；霸道的經濟可大、王道的經濟可久。

王道的新經濟分析模式基本上是採取「多元論」的觀點，也就是不同的經濟體應可因地、因時制宜，選擇適合自己的模式¹⁰。

這種新的分析及選擇方式可以透過編制完整的「社會會計矩陣」，以國民幸福指標、人民主觀感受指標等新的統計及指標來加以實踐；國民福祉應為不同階層人民所得之加權平均，而窮人權數應大於富人，不應只反應個人平均所得。

¹⁰ 朱雲鵬，「關鍵處方：引領新興國家走向富強的人物和作為」，台北，麥格羅希爾，2010。

歷史學家湯恩比認為二十世紀的世界發展與西元前兩三百年戰國時期的中國十分相似。這裡面除了各國為各種利益爭戰不休以外，即使和平時期各國利益的弱肉強食也發展得淋漓盡致。西方的主流信仰是：「自由貿易」和「市場機制」。但是上世紀末各大國紛紛走入發展瓶頸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些不是萬靈丹 11。

從產業經濟來看，熊彼得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理論風行一時 12，而我們實際上看到的卻往往是，技術先進的國家得到新的「創造」，而落後的國家得到的是「破壞」——這是「霸道」的新平衡。

王道思維的合作模式是先進國與落後國共建垂直整合的產業，用最先進的技術協助弱國發展其民生產業，共享經濟成果。這種垂直整合須充分尊重彼此的環境與文化特色及差異，所有的「價值」都是共創共享，所有的問題都是共同解決。

這樣的模式看來平淡無奇，甚至理所當然，但是從上世紀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實際運作卻完全背此道而行。我們看到的是，吃肉者指責啃骨頭者「血汗工廠」、「破壞環境」——即使破壞的是你自己的環境。

再從國際金融的新秩序方面來看，上世紀以來，國際成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 (IMF) 等組織，以確保全球金融之穩定，在弱勢貨幣遭遇投機攻擊或其他因素形成危機時，協助其度過難關。

但是 IMF 提供的常是「霸道」的救援；受援國必須接受唯一的「華盛頓共識」：削減預算、解除價格管制、開放市場.....等，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泰國接受 IMF 援助，經濟卻雪上加霜，引發經濟學者對 IMF 相當嚴厲的批評 13。

大中華及東亞經濟圈 (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 也正好是所謂的「東亞文化圈 14」，擁有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外匯總值，應考慮成立亞洲的 IMF，以王道文化作為操作的原則。

¹¹ Stiglitz, J.E.,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02

¹² Schumpeter, J.,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rd Ed., N.Y.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¹³ Sachs, J., "IMF and the Asian Flu," The American Prospect, 1998

¹⁴ 西嶋定生，「東亞世界的形成」，《岩波講座世界歷史》4，1983

王道思維的救援應採取「多元化」的方式，由專案小組專家針對問題之特質、其文化背景、歷史軌跡.....等，提出量身打造的紓困方案，不但能獲得更多尊敬及感謝，如執行得當，也將更有效率。

結語 「永續」的倫理—王道

強勢的大國在上個世紀末推出了另一個「霸道」的推手——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後面隱藏著幾個重要的後果：

- (一) 科技優勢從傳統的新製程、新產品的發明，跨越到新軟體、新服務，其優勢從製造業轉移到掌控力更強大的服務業，落後國家即使傾全力 (廉價勞力、犧牲環保.....等) 擠身代工製造，很快就淪為薄利企業，甚至被指責為血汗工廠。
- (二) 消除貿易障礙——從 GATT、WTO，到 FTA，TPP.....等，其結果必然是優勢的經濟體對弱勢者可以「名正言順」地享受無障礙的攻城掠地，如入無人之境。
- (三) 強勢文化慣常不自覺地步入「自我道德化」之途，然後發揮「己所欲必施於人」的價值觀，強加諸弱勢文化，終於造成文化衝突。

當我們從農村進入工商社會時，傳統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如五倫，無論是父子、夫婦、兄弟、親友 (除君臣外)，所規範的都是人與所熟悉的人之間的倫常關係，但進入工商社會時，人們每天碰到的多半是不認識的人，於是人與陌生人之間最起碼的尊重及同理心就成了我們所欠缺的「第六倫」。

當國際社會從國家主權透過「全球化」進入「地球村」的時代，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地球村的「第六倫」在哪裡？

先進國家的政治人物及學者專家為「地球村」制定了許多遊戲規則，然而任

何一種可長久操作的「遊戲規則」，必需要有更上位的「倫理」。

在「永續發展」的三支柱框架外，不少學者提出「文化多樣性」是第四根支柱。事實上在我們談「環境」這根支柱時，廣義地包含了「自然」及「人」，因此也就包含了「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樣性」。不同面向的關注者可能還會提出其他更多的「支柱」，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在考慮「政策」、「遊戲規則」等實際操作時，其實我們真正欠缺的就是更上位的「永續的倫理」。

在西方的科技文明、資本主義和基督教文化的結合下，二十世紀達到了成長的顛峰，但為人類帶來的諸多問題也深積無解。在二十一世紀中我們可以預料，上世紀的榮景很難再造重現，但所產生的問題必將惡化。

「向東方找答案」是不少西方有識之士的看法。兩岸政府及人民應該透過學術、教育、宗教等管道，從建立完整的「王道」論述到實行「王道」政治做起，用「王道」來推動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讓中華文化對新世紀的世界文明作出最大的貢獻。